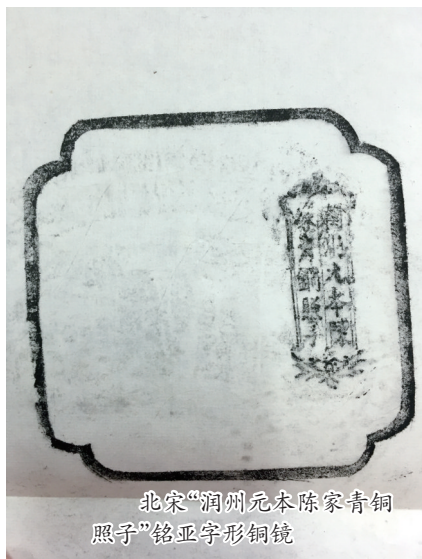


# 传承千年的镇江制镜『老字号』



北宋“润州元本陈家青铜照子”铭亚字形铜镜



宋『镇江府陈家青铜照子记』铭文葵花铜镜拓片

□ 马彦如 张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作为妆饰理容的生活用品，镜子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41号墓葬中出土的桥形钮素面圆镜，证明古人在至少4000多年前就开始了青铜镜的制作和使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铸镜业始于齐家文化而盛行于战国时期，经过两汉的繁荣期后，至唐代达到鼎盛。在玻璃镜普及之前，铜镜一直是古人“自鉴”的用具，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铜”就是指铜镜。

宋代时，镇江制镜业已颇具规模。从考古发现的部分字号铭文镜中可以得知，城内制镜作坊有多处，有的还是数百年的老字号，并拥有一批制镜名师。铜镜一面光滑，镜背的空间则被古人不避烦琐地雕铸了繁缛花纹。宋代铜镜以形制多样、题材集中，重实用非装饰，细线浅雕为重要技法，缠枝花卉镜、宗教色彩铜镜及商标铭文镜都是宋代铜镜的典型代表，而商标铭文更是重要的时代特征。铜镜作坊一般会将自家的字号以铭文的形式刻在镜背上，并用双线框起，这种形式称之为“牌记”。通过对宋代铜镜牌记铭文的观察，铸镜作坊分布广泛，品牌众多，反映了铜镜鲜明的商品化倾向和商业竞争趋势。

镇江考古出土的牌记铭文镜有“润州元本陈家青铜照子”“润州徐家六叔第二等青铜照”“镇江府陈家青铜照子记”“镇江府水军酒库前石家照子”等。牌记铭文镜主要流行于南宋时期，考古发现镇江制造的宋代牌记铭文镜中，明确属于北宋时期的产品，即标明为“润州”的地名不多。因为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升润州为镇江府”，镜铭“润州”者必在政和三年改制之前，此类镜时代属北宋；而镜铭“镇江府”者，则在政和三年之后，此类镜时代属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

宋代从润州到镇江的制镜作坊店号，考古资料中所见有陈家、徐家和石家。“陈家”是镇江的制镜老字号，在镇江生产牌记铭文镜中占比最大，其北宋时期生产的一面铜镜标有“元本陈家”字样，反映“陈家镜”渊源之久远，应是镇江古代铜镜制作的代表。

考古学家王仲殊考证，三国时期京城（京口）匠师陈氏闻名遐迩，其中有一支东渡日本作镜，而留在京口的陈氏家族传承制镜技艺，繁衍生息，直到南宋时期，历经千年而不衰。北宋润州陈家即是三国陈氏

匠师的后裔，所以才敢于亮出“元本陈家”的牌子。

以名师挂牌吸引眼球招徕顾客，是宋代商业行为中常见的现象，所谓匠师、业主、名牌三位一体。由标名为“徐家六叔”铜镜制作店推测，润州“徐家”是一大家族，“六叔”之外，可能还有徐氏其他匠师的分号。

镇江后出的制镜名号还见有“石家”，专家认为，可能是湖州石家分设到镇江的一支。这一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如镇江出土的一面“湖州周寄居婺州炼铜照子”镜，清楚地表明在婺州开业的湖州周家，仍冠以“湖州周家”的名牌，反映出宋代商业的激烈竞争，除了产品远销占领市场之外，还径直到其他地方开店列肆。同时，市场常有冒充名牌的假冒商品出现，因此在商标上加以“真石家”“真正石家”“湖州祖业真石家”等字样，以正视听，润州“元本陈家”的标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代的铜镜多以斤两计价。镇江地区出土的铜镜铭文中可见明码标价，标记与牌记铭文分开铸印的现象，如：“湖州真正石家青铜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六文”“湖州石家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以及镇江出土的“湖州周家寄居婺州炼铜照子每两一百文”。从所标价格看，分为“一百文”和“六十文”两种。

这种价格差异存在的原因，究竟是业主为了压价销售，抑或是铜镜质量存在的级差？很难论定。但镇江制造的铜镜中有一面直接标有质量等级——“润州徐家六叔第二等青铜照”，表明“徐六叔”镜铺生产出售的铜镜至少分两个等级，按质售价，这与有的铜镜上标价每两一百文和六十文所分两等相吻合。

铜镜资料中出现的几处宋代镇江制镜铺，具体位置不详，未见志载。可有一面“石家”镜上明确标明地址在“镇江水军酒库前”。宋时镇江驻军所开设的酒库有四处：即“中库在长桥之北，西库在果子巷内，西上库在绿水桥之西，江口库在京口闸之西”。而镇江水军所立军寨有三处，即洗马桥、西津西仓门、金鸡岭。洗马桥地址在宋城西侧江口镇附近，水军酒库应该就是“江口库”，据此，铜镜上铸印的“石家”制镜铺，应在江口镇上。

铜镜的铸造历经制模、制范、浇注和打磨等工序，包含了我国古代浓厚的文化艺术信息。经济发达、原料充足、江河交汇的便利交通是镇江地区宋代铸镜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也反映了宋代镇江经济社会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

## 问道茅山三千年④

□ 张春蕾 夏和生

（四）《乾元观记》石碑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所立。碑石为石灰石，高1.83米，宽0.96米，厚0.2米。《乾元观记》碑文为大理寺卿陈文烛（字玉叔）所撰，以行书写成，内容主要记载乾元观全真祖派开山祖师希言道人的活动事迹，是研究乾元观历史和闫希言生平的重要依据。碑阴刻着《乾元观天心庵碑记》，主要记载位于大茅峰南面的乾元观下院——天心庵的建庵经过。刻石时间为乾隆己丑年（1769年）七月，碑文为楷书。此碑是乾元观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石碑，现保存在观内，是乾元观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三、茅山镇山之宝

茅山四宝是茅山传坛八件宝物中的四件，另四件宝物已经遗失。不少书籍中都记载这镇山四宝是宋徽宗赐给茅山上清宗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的，查阅史料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据元代《茅山志》卷十一“上清品”记载：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赵煦的皇后孟氏不慎将尖针吞于喉中，朝内御医束手无策。哲宗皇帝心急如焚，广贴榜文，四招医士，然举国上下，无人能医。刘混康宗师闻之，飘然进京入宫，用茅山道教秘传符篆和丹药催吐，使孟后吐出尖针，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哲宗皇帝龙颜大悦，深感茅山道士医道神奇，便请刘混康住持京师上清储祥宫，并赐号“洞元通妙法师”。刘混康在上清储祥宫居住不久，辞请回归茅山。宋绍圣四年（1097年），哲宗敕江宁府修建刘混康所居潜神庵，工竣敕名为“元符观”，以示纪念；别敕茅山上清经篆宗坛，同江西贵溪龙虎山、江西清江阁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

宋徽宗继位后，于建中元年（1101年）诏请刘混康再赴京师。崇宁元年（1102年），刘混康屡告归山，徽宗挽留不住，遣使送其归山，先后赐送九老仙都君印、景震玉樞（lǚ）具剑、御制诗颂书画等，“赐予不能悉记”。

徽宗所赐宝物在元代《茅山志》中并未

一一列举，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句容知县鲍慎辞所撰《茅山元符观颂碑》的记载倒比较详细：“（刘混康）未几告归，赐号葆真观妙先生，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烧香筒、红罗、龙扇诸物，又亲御毫楮，为书度人、清静、六甲神符三经以宠贻之，皆惊世骇目，不可名之宝。”但在元代《茅山志》与鲍慎辞的记载中，除了九老仙都君印外，其他宝物与今天所见的茅山镇山之宝并不完全相符。而明代《茅山志》“明懿典”载：“传坛诸宝：九老仙都君玉印一颗、合明天帝日敕玉符一道、御赐宗坛玉圭一笏、哈砚一座、宣和御赐玉靶剑一口、《上清大洞秘篆》十二卷轴、《上清大洞卷策筒词》十二卷轴、《辽王诗筒》一卷，共计八件，以作镇山之宝。”这里记载了现存的茅山镇山四宝，但并未说明八宝的来历。所以将镇山之宝笼统归为宋徽宗对刘混康宗师的赐予，是缺少依据的。

宋代以后，茅山道教传坛八件珍宝，历经沧桑，屡遭兵火，后四宝已经失传，前四宝玉印、玉符、玉圭、哈砚至今仍然保留，茅山道教将其称之为“镇山四宝”或“镇坛四宝”。“文革”期间，四宝被抄，后被南京博物院收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四宝又回归茅山道院，现存于茅山大茅峰九霄万福宫内。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四件宝物。

（一）玉印

白玉制成，洁白无瑕。玉印长6.8厘米，宽6.4厘米，厚2厘米，上刻篆体阳文“九老仙都君印”六字。据传此印是用我国“和氏璧”的一部分刻制而成，有“夜食四两朱砂，日盖千张黄表”之说。就是说，夜里浸在四两朱砂里，第二天就可以连续盖千张黄表。又传说：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玉印被收至皇宫，被改制为“奉天承运文宝”的玉玺。但三刻三试，印迹仍是“九老仙都君印”六个篆体。明太祖无奈，只得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命人送还茅山道院。每逢茅山香期庙会期间，前来茅山朝圣进香的善男信女，都要请茅山道士在其香袋和腰带之上盖一颗“九老仙都君印”，意即能消灾进寿，遇难呈祥。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